



范东升编,北京出版社,2025年十月  
范长江著,

1935年7月,四川松潘黄龙寺的一个夜晚,一位26岁的青年记者彻夜未眠,在日记中写道:“记者当值时,身披棉被,手持手枪,仰观满天星斗,耳听鸣凤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所以终身奔劳不休者,特为生存之必要而所驱使,并无特别之意义,故本于生存之必要而活动,此即为人生之真谛。”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面对大自然的苍茫与凛冽,人更容易触及“生存之必要”这一根本命题。对曾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爱国青年范长江而言,正是这种思考的迫切,驱动他行走在国西北大地。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生于四川内江。他早年投笔从戎,后立志救国,转而投身新闻事业。1935年至1937年间,他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发表大量署名“长江”的旅述通讯,一举成名。这些深入西北的调查纪行,于1936年结集出版为《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初版即广受欢迎。后来《中国的西北角》再版9次,《塞上行》印行6版,在当时的出版界实属罕见。

1980年,为纪念范长江逝世十周年,新华出版社时隔40余年再版此书,由其夫人沈谱作序,依旧一书难求。2025年,适逢范长江西

北考察90周年,其子范东升依据1930年代原版对全书进行整理、校勘与增补,推出《中国的西北角(勘注增补本)》。这一最新版本除收录《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全书外,还增入范长江所撰“红军与长征”系列文章及多篇西北评论、绥远抗战述评。该书纠正各版本差错近百处,新增注释千余条,并附地图与历史影像,体量达50万字。

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始于成都,途经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全程6000余里。关于此行初衷,他在《从〈中国的西北角〉到〈塞上行〉》中写道:“红军要北上抗日,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我想搞清楚这一个全中国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我自己关心的大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势下,即便有《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作保,他能依靠的也不过是“一个证件、一个名义”,既无工资与差旅费,文责亦需自负。支撑他前行的真正动力,是对西北战略重要性的清醒认识,以及“最好能到红军中去,彻底弄个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注定是一场考验体力、意志甚至生命的苦旅。他的文章在《大公报》持续刊发,视角始终紧扣读者所关心的民生现实。因此,文中大量篇幅描绘了旧中国西北地区的鸦片泛滥、交通艰难与民生困苦。即便是对那些曾予他方便的官员,他也未因人情而违背记者如实记录的准则,而是运用近乎史家的春秋笔法,在不能

明言之处,隐晦“透露”。他在书中坦言,相关报道曾引发马步芳等地方要员的强烈不满,甚至使他遭到驱逐,足见当时写作环境之险恶。

西北地区历来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范长江以细腻笔触记录了汉、藏、回等民族的生活习俗与精神面貌。回望1930年代的西北,对当时大多仅靠报纸获取信息的城市读者而言,那是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他一路的忠实记录,不仅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更在日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新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该书作为经典文本,其影响延续至今。它启示我们,真正打动人心的报道,永远来自身体力行“跑”出来的新闻,来自“在场”的观察。正如他一贯强调的新闻原则:“勿以现实事实附会古代文章,或以古代文章曲定现代事实”;“必对于实际之事物,加以体察,始能得乎知识之真诠”。这不仅是方法,更是新闻人应当恪守的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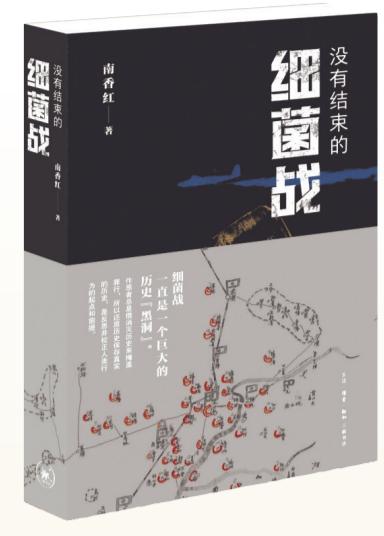
该书在旅行文学的脉络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它在如实报道之外,兼具鲜明的文学品格与文体自觉。行文上承中国文人游记传统——从《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到近代梁启超的海外书写,再到陈渠珍的《艽野尘梦》,也与当下如罗新《从大都到上都》、胡成《榆林道》、杨潇《重走》等以“行走—记录—思考”回应现实关切的写作遥相呼应。范长江的纪行文字,以现

代白话描摹地方风物,以记者视角展开叙述与评判,注重新闻真实与读者接受,而非囿于个人抒情。这种价值取向,亦体现出“五四”启蒙一代对“文以载道”的继承。

从世界新闻写作史的视野看,该书同样值得重视。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家盖伊·特立斯、琼·狄迪恩等人,倡导新闻的文学化表达,强调记者的在场与场景的沉浸。而范长江早在30年前,就已将这些手法娴熟运用于西北纪行之中。遗憾的是,受限于中文作品的海外传播条件,此书未能如《西行漫记》一般进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时至今日,重读《中国的西北角》,其意义不在细究作者个人经历与写作动机的枝节,而应看到它作为新闻史上里程碑的典范价值。它既是旅行通讯,也是新闻特稿的早期范本。范长江以身体力行的“行走”与诚实的“在场”,构建出报道的信度,也以精神饱满的叙事与生动的细节,增强了新闻的感染力。对今天的写作与研究者而言,《中国的西北角》是一种持续的提醒:唯有忠实记录、独立思考,文字才能跨越时间,沉淀为可信的历史。而范长江先生那份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与实践精神,也将继续激励一代代追求“文以载道”的后来者,行走不止,记录不止。

(作者李蕙萌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徐志伟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南香红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5月

本书呈现了中国普通百姓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数十年间,因日本军国主义在华秘密研发生化武器并实施细菌战而承受的深重苦难。作者历时数十年,深入调查、记录并声援细菌战受害者群体,并基于大量可靠的史料、档案与一手访谈,真实还原了诸多历史细节与隐没的真相

## 为什么要写「细菌战」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南香红的《没有结束的细菌战》面世。在此之前,学界与出版界已有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等大量相关著作,南香红本人也曾出版《王选的八年抗战》《细菌战:鼠疫围城》等作品。那么,她为何仍要写作这本《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该书的写作缘起于2002年,当时南香红在《南方周末》北京记者工作站,因采访细菌战受害者亲属王选而撰写了《她把细菌战真相告诉世界》一文。对多数记者而言,一篇报道的完成往往意味着一项工作的结束,但南香红没有止步于此。她意识到这段历史的重要与紧迫,从此一路追踪,持续记录,直至今日。该书的写作,体现出南香红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良知与坚守。她曾任职于《新疆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从事新闻工作30余年。尽管近年转型为非虚构作家,她骨子里仍是一名记者。那份新闻人的底色、良知与执着,从未褪色。她在本书序言中写道:“作为一名记者,所能做的不多,唯有记录。”“所能做的不多”是她一贯的谦辞。然而,“还原历史、保存真相”需要记者,“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并看见”更需要优秀的记者。

正如南香红所说:“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因此还原并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与前提。”该书所聚焦的“细菌战”,即日军在“二战”期间以鼠疫、霍乱等细菌或病毒作为武器,于中国浙江、湖南、江西等地毒害人畜、毁坏作物,人为制造瘟疫的极端战争行为。中国是世界上首个遭受细菌战大规模攻击的国家,日军此举造成巨大伤亡,却始终矢口否认、蓄意掩盖。因此,揭露这段历史真相,至今仍具紧迫意义。

该书所呈现的史实触目惊心:金华一个小小的崇山村,据村民王晋悌与其同伴调查,就有1240人受害于细菌战;日本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启动细菌武器研究并秘密开发;731部队在1941年编制曾达3500人,拥有十多套当时世界未知、人类毫无预防手段的细菌武器,形成从实验、制造到实战的完整体系;其实验直接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体随后被送入焚尸炉;该部队每月可生产约300公斤净鼠疫菌,或500至600公斤净炭疽菌,或一千公斤净霍乱菌。尽管在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中,日本最高法院全面认定了180名中国受害者原告所举证的细菌战事实,首次在司法层面承认细菌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伤害,然而直至今日,细菌战仍是日本国家最高层的“taboo”(禁忌):不道歉赔偿,对受害者的呼声置若罔闻。这些被长期遮蔽的历史真相亟待被更多人知晓。该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以真实、清晰、准确的笔触还原历史原貌,既揭露了日军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也为人类反思战争、校正前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言。

全书60余万字,引用了大量权威而真实的史料,既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也包括细菌战参与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口述实录,更辅以近200幅珍贵图片。书中涉及的主要人物均配有照片,真正做到了“有图有真相”。翔实的文字与具象的视觉材料,既有力地支撑了叙述的真实性,也拉近了读者与那段历史的距离。为增强读者的临场感,南香红不仅运用举例、摹状、列数字、打比方、画图表等多种说明手法,更有意设置悬念、构建冲突、展开对比。例如,她将细菌战——即生化武器的杀伤力,与美军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进行比较,指出细菌武器的巨大危害,“即便战争已过去80年,那些曾被污染的地区仍可检测到活体病菌,持续威胁着人类生存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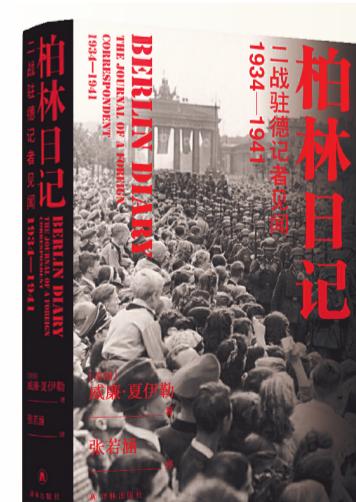
该书的书名,以“没有结束”4字,坚定地昭示了一个事实:日本在近百年前发动的细菌战,其影响与伤害远未终结。该书的问世,再一次为世人敲响警钟。历史上的细菌战曾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受害者虽得到一定救助,却从未获得应有的精神抚慰与正式道歉。他们的伤痛依然存在,细菌战埋下的隐患也远未彻底清除。

历史不容遗忘,真相不可回避。《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是一本非写不可的书,也是一本正当其时的书。它既见证了作者扎实的职业能力与深厚的写作功力,也再次提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穿越历史的笔尖

□闻明



作者威廉·夏伊勒以驻德记者的身份,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系列关键历史事件。他充分发挥新闻专业素养,捕捉了那个特殊年代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脉动与时代变局。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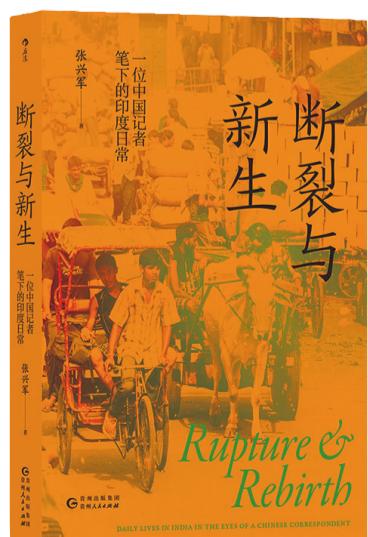
【美】威廉·夏伊勒著,译林出版社,2020年11月

的是民众如宗教狂热般的偶像崇拜。在久居柏林的外国记者眼中,德国的纳粹化并非不可理解。他们早已从细微迹象中预见到风暴的来临。因此,当接到“开战了”的电话时,夏伊勒内心不是震惊,而是某种笃定的确认。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1940年6月,德军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几乎横扫西欧,仅剩英国在顽强抵抗。每个夜晚,沦陷区的比利时人与法国人都在期盼英军到来,而德军已乐观预计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夏伊勒于1934年从巴黎抵达柏林,刚下火车便遭到秘密警察的刁难。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座城市已与一年前截然不同。老柏林自由开放的氛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

(作者系书评人)

## 能够抵达和记录,是身为记者的幸运

□张兴军



《断裂与新生——一位中国记者笔下的印度日常》,张兴军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河南分社副总编辑)